

失业保险、流动性约束及家庭消费

谢强 唐珏 吕思诺 白金*

摘要: 厘清失业保险的消费平滑效应, 对于优化其基金配置、加强民生保障功能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家户月度记账数据, 发现失业金标准提高显著增加了失业者家庭消费, 消费变化幅度明显。家庭生产理论与有限理性假说不足以解释上述结果, 而流动性约束假说与本文发现一致。并且, 本文发现失业金提升还显著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 包括增加具有长期收益的发展型消费。在失业问题不断凸显的背景下, 本文结论表明提升失业金标准是一项值得重视的政策。

关键词: 失业保险金; 家户消费; 流动性约束

DOI: 10.13821/j.cnki.ceq.2024.02.09

一、引言

受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交叠影响, 我国失业问题日益凸显、失业风险增加, 并且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也让失业更为频繁。在上述背景下, 如何保障失业人员的生活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国际上失业保险金被认为是保障生活的重要工具。现大量以发达国家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发现, 失业保险金可有效改善消费 (Gruber, 1997; East and Kuka, 2015; Kroft and Notowidigdo, 2016; Ganong and Noel, 2019; Ganong et al., 2022)。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也是为失业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但当前, 我国失业保险的支出重心在企业端, 失业保险金发放则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导致国内各界普遍认为我国低待遇特征下的失业保险金未能平滑消费, 缺失生活保障功能 (李珍等, 2020; 郑秉文, 2010; 张盈华等, 2019)。已有认知大多基于定性分析所得, 缺乏基于定量研究的严谨判断。我国失业保险金的生活保障效果与作用规律仍不清楚。那么将更多资金用于失业金发放, 提高支付水平, 能否更好地实现失业保险的生活保障功能? 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政策上提升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能否高效转化为失业群体的消费。

本文利用家户月度记账数据, 定量考察我国失业保险金法定标准 (以下简称“失业金标准”) 提高的消费转化效果及作用规律。然而, 要在实证上准确识别失业金标准对消费的影响, 存在以下挑战: (1) 收入的变化可能被预期: 难以保证收入的变化是不可

* 谢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唐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吕思诺,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白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吕思诺,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100081; 电话: 17319221637; E-mail: 202301023@muc.edu.c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72203060、72204154) 的资助。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预期的事件 (Low et al., 2010), 如失业者可能会预期到所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水平,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2) 闲暇时间变化对估计结果的扰动: 如 Gruber (1997)、East and Kuka (2015) 等通过分析失业前后消费下降幅度与失业金标准差异间的关系, 估计失业保险金的消费平滑效应。但家庭生产假说认为失业前后同时伴随着闲暇时间的改变, 消费对失业保险金的敏感变化可能只是来源于闲暇时间对消费的替代, 而非来自收入变化的驱动 (Aguiar and Hurst, 2005; Banks et al., 1998; Bernheim et al., 2001)。(3) 数据限制: 失业是一个相对短期的事件且消费是一种家庭决策, 已有研究受限于年度、个人层面数据, 未能高频且持续地观测家庭收入、消费及个人就业等信息, 无法准确识别及动态观测失业金标准变化下家庭消费的反应 (Ganong and Noel, 2019)。

为克服上述挑战, 本文利用我国 2010—2012 年、2015—2016 年月度层面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基于失业金标准的不定期调整, 采用事件分析法系统考察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规律。基于上述分析有以下几点优势。(1) 克服了失业保险金变化可被预期的挑战, 以失业金标准的不定期调整作为冲击事件, 由于调整时间无规律, 难以被微观个体准确预期, 因此可有效识别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的因果效应。(2) 排除了闲暇时间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将样本限制为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后均保持失业状态的样本, 闲暇时间未变, 因此排除了闲暇时间变化 (劳动供给变化) 的干扰。(3) 更加准确且全面的估计,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Urban Household Survey, UHS) 数据高频且全面调查了包括个人就业、收入、工资、失业保险以及家庭各子类消费的信息, 这有利于更加准确及全面地理解家庭消费决策。

研究发现, 尽管我国家庭具有高储蓄特征, 但家庭通过自我储蓄未能完全消除失业冲击对家庭消费的负面影响。失业金标准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参保失业家庭的消费水平, 失业金标准增加 1 元导致消费增加 0.50 元且随时期逐渐增大, 表明失业保险金是帮助家庭应对失业冲击的有效手段。机制分析表明, 相比于低流动性约束群体, 失业金标准在高流动性约束群体中的消费改善效应尤为明显, 这与消费理论中的有限理性假说及家庭生产假说预测相悖, 与流动性约束假说一致, 流动性约束可解释本文所观测到的消费敏感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失业保险保障力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保障失业家庭的生活, 也有利于改善消费不平等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 失业金标准的提升还有利于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 提高了具有长期收益的食品营养以及教育、健康、交通通信等家庭发展型消费。这意味着失业金标准提升不仅能显著增加失业家庭的消费, 还有利于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提高具有长期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贡献有以下几点: (1) 本文系统厘清了失业金标准提升的消费平滑效果与资金效率, 这为优化失业保险基金在生活保障与就业保障间的资金配置, 加强失业保险保障民生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2) 系统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低待遇特征下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结构的作用规律, 弥补了现有研究仅关注发达国家高待遇特征下失业保险金作用规律的不足; (3) 为流动性约束假说提供了证据, 定量验证流动性约束是失业家庭消费反应敏感的重要解释, 有利于理解家庭经济决策; (4) 提供了更加准确及动态的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基于个人年度数据分析失业保险金的影响, 无法准确识别失业保险金变化下家庭消费行为的调整模式, 本文利用家庭月度数据及事件分析法为失业保险的消费影响提供了更加准确及全面的分析。

二、文献综述

失业保险的经济影响是文献中的一个经典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其中，大量文献研究了失业保险金对个人与企业决策的扭曲效应（Chodorow-Reich et al., 2019; Jäger et al., 2020; Johnston and Mas, 2018; Marinescu and Skandalis, 2021），尤为关注个人就业决策中的道德风险及企业的劳动力雇佣决策等问题。然而，已有文献对于在制度设计或福利评估中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失业保险收益的研究却极为有限。

失业保险最大的福利收益来源是消费平滑。现有文献主要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失业金标准提高或保障期限延长对失业者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评估其消费平滑效应。尽管现有文献都发现了显著的消费改善效应，但关于影响程度的结论差异明显。Gruber (1997) 发现失业保险替代率每上升 10 个百分点有利于美国失业者的食品消费下降幅度减缓 2.65%，消费平滑效应较大。但 Browning and Crossley (2001) 发现失业保险替代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导致加拿大失业者的家庭消费下降幅度仅减缓 0.80%，消费平滑效果较小。East and Kuka (2015) 发现失业保险的消费平滑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并认为是由于失业率的差异所导致。然而，Kroft and Notowidigdo (2016) 发现失业保险虽具有显著的消费平滑效应但并不随失业率的变化而改变。此外，近期少量研究利用更为高频的美国银行数据考察发现，失业保险具有显著且较大的消费平滑效应（Coombs et al., 2021; Ganong and Noel, 2019; Ganong et al., 2022）。

在失业保险福利收益方面，还有少量文献从健康、教育等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失业保险金能有效减缓失业冲击带来的各类负面冲击。如 Fu and Liu (2019)、Kuka (2020) 和 Tefft (2011) 从健康视角发现失业保险能有效减缓失业冲击带来的健康恶化；Barr and Turner (2015) 和 Regmi (2019) 发现失业保险金可显著提高大学入学率与儿童教育水平。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利用更加全面的家户月度记账数据同时从消费、健康与教育等视角对失业保险金的收益进行了分析，丰富了已有研究。

相比于国际研究，国内文献受限于数据几乎未考察我国失业保险的福利收益。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我国失业保险的制度发展问题（刘军强，2022；李珍和王海东，2010；李珍等，2020；郑秉文，2010；张盈华等，2019），以及失业保险待遇对失业持续时间、就业、求职努力及公司财务杠杆等经济影响（黄觉波等，2006；吴永球等，2008；乔雪和陈济冬，2011；张燕和王元月，2008；赵静，2014；梁斌和冀慧，2020；彭章等，2021），其中尤为关注对就业搜寻努力及再就业的影响。

综上所述，失业保险福利收益的定量研究在国内尤为缺乏。已有关于失业保险消费平滑效应的研究，大多基于发达国家的个人年度微观数据探讨高失业保险待遇对消费的影响，鲜有研究利用更为高频的微观数据，系统分析其他发展阶段的国家中低失业保险待遇对消费的作用。本文基于详细且相对高频的家庭月度消费与就业数据，准确考察失业金标准提高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失业者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规律，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三、制度背景

(一) 失业与家庭消费

失业冲击会导致收入的大幅下降,可能会给家庭消费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我国居民具有高储蓄率的特征,如2010—2021年我国城镇家庭居民储蓄率从0.26增长至0.36且呈持续上升趋势。^①在高储蓄率特征下,我国家庭被认为可能通过储蓄自我平滑失业冲击对消费的负面影响。

图1报告了失业冲击前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月度储蓄、收入与消费的变化。^②可以发现,失业冲击后家庭收入急剧下降,提取(存入)储蓄急剧增多(减少),表明我国家庭在面临失业冲击时确实会通过调整家庭储蓄予以应对。但图1(e)和图1(f)显示失业后家庭消费仍大幅降低,这意味着高储蓄特征无法让家庭完全平滑失业对家庭消费的负面影响。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网络仍是帮助家庭应对失业等冲击的重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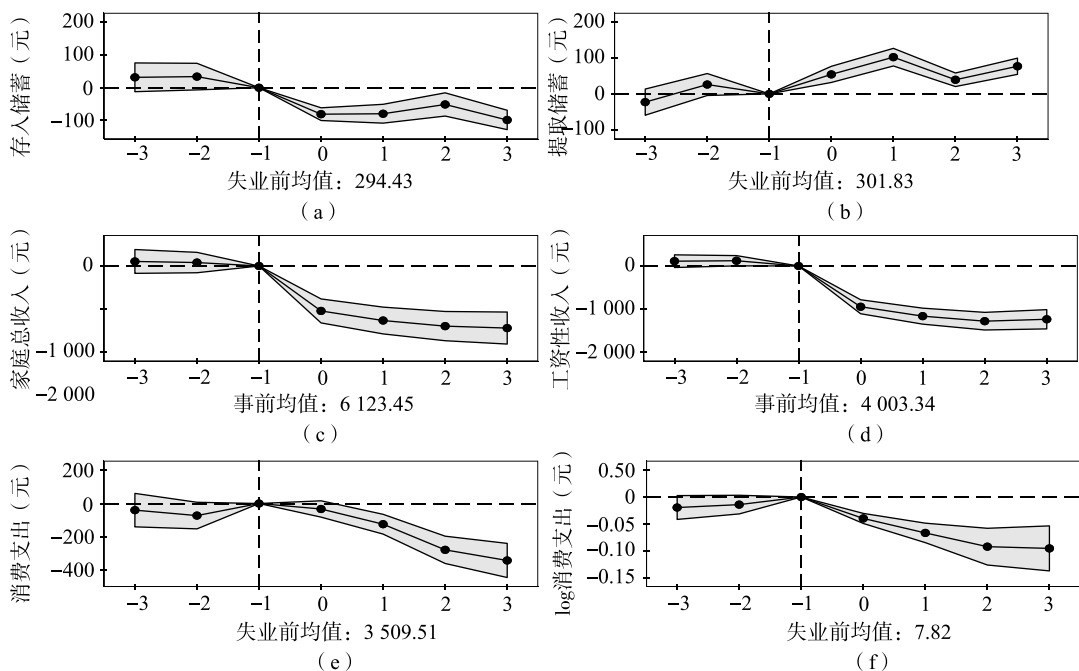


图1 失业与城镇家庭收入和消费

注:横轴表示相对失业的月份。阴影表示估计系数的+(-)95%置信区间。

(二) 中国失业保险制度与待遇标准

自1999年《失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258号)颁布实施,二十年来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功能日趋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制度目标以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为主。之后,随着失业保险制度功能的发展,政策目标扩展至预防失业、促进就业与稳定

^① 数据来源于2010—2021年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② 以失业冲击为事件,利用事件分析法估计所得,模型设定与方程(1)类似。

就业等方面,形成了“保障生活、促进就业、预防失业”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22 958万人,全年共为608万名失业人员提供了失业保险金。

在失业保险待遇方面,我国待遇水平偏低。1986—1993年,我国失业保险待遇(当时称待业救济金)以职工离开企业前两年内本人月平均标准工资额为基数予以发放,约为平均工资的50%—75%,即30—80元/月;1994—1998年,失业保险待遇(称待业救济金)的发放标准以社会救济金为基准,相当于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金额的120%—150%,约90—130元/月;自1999年至今,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金)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予以发放,约为最低工资的60%—80%。2017年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7〕71号)强调逐步将失业金标准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但从全国实际水平看,2019—2021年我国失业金平均发放标准分别为1 393元/月、1 506元/月和1 585元/月,替代率(失业保险金/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不到19%^①,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失业金标准,如美国的替代率(失业保险金/失业前工资)约为50%(Kuka, 2020)、加拿大的替代率约为60%(Browning and Crossley, 2001)。

此外,在基金支出方面,我国失业保险的政策目标虽是三位一体,但基金支出却明显呈现出重企业、轻个人的趋势,就业保障支出规模大幅增长,生活保障支出尤为保守。从资金效率上看,低收入者具有的高边际消费倾向可能让流向失业者的失业保险资金更加直接且高效(刘军强, 2022)。如何在保障生活与促进就业间合理高效地配置失业保险基金,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回答上述问题需厘清我国失业保险资金在保障生活中的作用效果。国内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系统评估,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2010—2012年、2015—2016年的UHS数据。该数据为家户月度记账数据,属于月度追踪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每年会替换其中1/3的家户样本,即每三年调查中所有的家户将被全部替换。UHS覆盖辽宁省、上海市、四川省、广东省四个省(直辖市)内的50多个地级市200多个县,约共5万个家户。UHS在月度层面详细记录了家户的所有收入与支出信息,以及家户成员的基本特征。

本文旨在考察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失业者家庭消费的影响,为避免就业状态变化的扰动,本文将样本限制为:(1)在样本观测期内有家庭成员由就业转变为失业且在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家庭;(2)经历失业的家庭成员在观测期内为劳动年龄人口,即18—60岁的男性与18—50岁的女性,不包括因学业、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等因素未就业的个体以及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在观测期内从未就业过)的个体;(3)事件窗口期内,家庭成员就业状态在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后未变的家庭;(4)限制家户为常

^① 数据来源于2019—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见的家庭结构,剔除成员人数超过8人的家户;(5)由于事件分析法要求家户在事件前后被连续观测到,在权衡样本代表性及估计有效性的基础上,将事件窗口期设为失业金标准提升前的3个月与提升后的4个月(共7个月),并且进一步将样本限制为在事件发生前2个月及后2个月共4个月均被连续观测到的个体。

关注失业保险的参保群体而非领取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失业保险的领取更为内生,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的决定因素可能与消费变化的决定因素相关,会直接导致估计的偏差,如若只有那些没有储蓄的个人领取了失业保险,这会高估失业保险的消费平滑效应。第二,识别出失业保险的意向性处理效应(intent to treat, ITT)与政策更为相关(Browning and Crossley, 2001; East and Kuka, 2015; Gruber, 1997)。一方面,因为该效应确定了失业金标准变化对所有参保失业者消费平滑的影响,而不仅仅是领取了失业保险金这一子群体的影响;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是通过调整失业保险金的法定标准影响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而非控制个人实际领取到的失业保险金。第三,个人报告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水平更可能存在偏差。此外,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也分析了在失业保险领取样本内失业金标准的影响。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消费、家庭生存型消费(食品、服装、住房、日用品、家庭设备消费)、家庭发展型消费(医疗、保健、教育、文娱、交通通信)。分析中对所有的结果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失业者年龄、教育、性别与婚姻等特征。附录I描述了回归样本中结果变量的统计性特征。^①

(二) 实证方法

在失业金标准调整方面,我国各地区已多次不定期地调整提高失业金标准^②,这为事件分析法的采用提供了支持。

本文使用非参数与参数两种事件分析法估计失业金标准提升的影响。参考Dobkin et al. (2018)和Miller et al. (2021),非参数事件分析法的回归模型如方程(1)所示。

$$Y_{ht} = \gamma_t + \delta_c + X_{ht}\alpha + \sum_{r=-3, r \neq -1}^3 \mu_r 1(t = t_c^* + r) + \epsilon_{ht}, \quad (1)$$

其中, Y_{ht} 为结果变量,表示家户 h 在 t 月的各类收入与支出等; γ_t 和 δ_c 分别表示月度、区(县)的固定效应。 X_{ht}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家户规模、失业者性别、婚姻、年龄及教育等; t_c^* 表示在该月份家户所在区(县)的失业金标准提升的月份; r 表示距离该事件的相对月份数, $r=0$ 表示失业金标准提升的月份。本文最为关注的参数为 μ_r ,表示结果变量相对于失业金标准提升前一个月($r=-1$)的差异。

此外,本文还使用参数事件分析法予以估计,回归方程如方程(2)所示:

^① 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② 为直观理解我国失业金标准调整情况,本文选取四个地区代表性地描述失业金标准的调整情况,具体如附录II所示。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失业金标准调整时间无明显规律。

$$Y_{ht} = \gamma_t + \delta_c + X_{ht}\alpha + \theta r + \sum_{r=0}^3 \mu_r 1(t = t_c^* + r) + \varepsilon_{ht}. \quad (2)$$

方程 (2) 的参数事件分析法包含事前的线性时间趋势 θr ；关注的参数为 μ_r ，表示结果变量相对于事前趋势的变动。

为将事件分析法的估计结果解释为因果效应，需满足的假设条件是失业金标准提升的时间应不可被个人准确预测。本文背景满足这一前提条件：一方面，根据附录 II 可知样本内除上海市外的其他地区（区、县）失业金标准提升时间无明显规律，难以被个人准确预测；另一方面，为验证失业金标准提升事件的不可预期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对此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稳健。

本文检验了政策规定的失业金标准提升是否显著提高了参保失业家庭的失业保险金水平。图 2 与表 1 列 (1) — (3) 分别描述了事件分析法的非参估计与参数估计结果。根据图 2 可知，失业保险金法定标准提升后仅失业保险金增加，家庭其他收入无任何变化趋势，表明参保失业家庭收入增加是由失业保险金提高所导致。参数估计结果与之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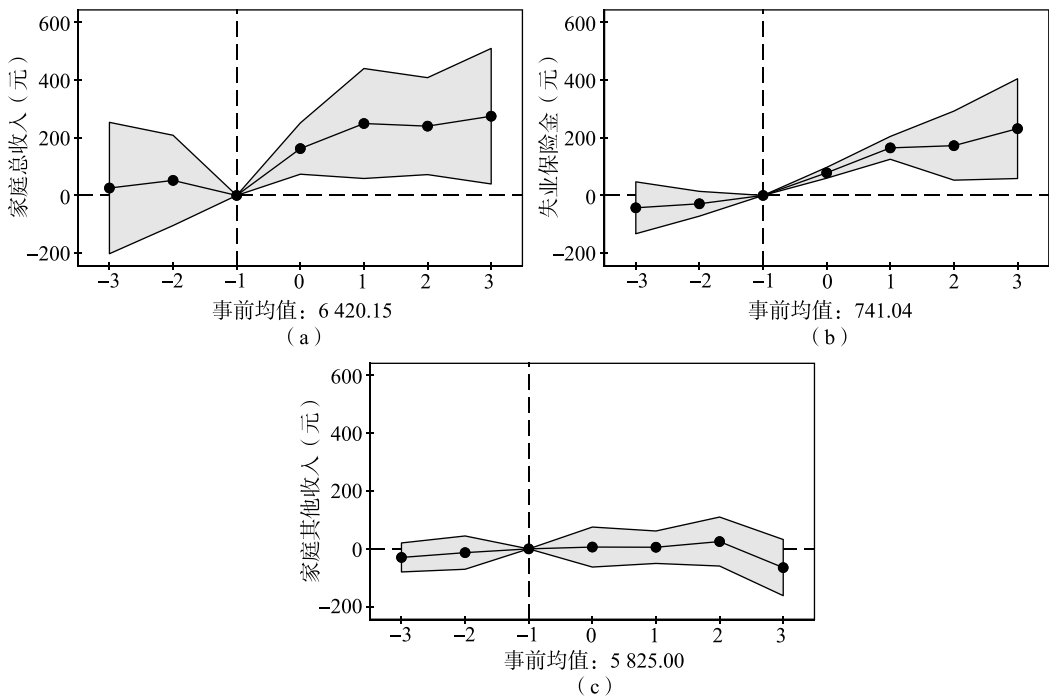


图 2 失业保险金提高与家庭收入

注：横轴表示相对失业保险金提高的月份。阴影表示估计系数的 ± (—) 95% 置信区间。

表 1 参数估计：失业金标准提高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总收入	失业金领取	其他收入	消费	log 消费
	(1)	(2)	(3)	(4)	(5)
相对月份					
0	165.77***	101.98***	16.74	82.83**	0.05***
	(38.59)	(23.11)	(24.63)	(24.32)	(0.01)

(续表)

	总收入	失业金领取	其他收入	消费	log 消费
	(1)	(2)	(3)	(4)	(5)
1	241.67*	187.86***	11.96	123.37	0.06**
	(114.61)	(32.44)	(25.05)	(63.93)	(0.03)
2	253.85**	185.85**	32.92	170.09**	0.06*
	(99.88)	(55.86)	(27.81)	(66.29)	(0.03)
3	274.97	250.65**	-55.82	226.24**	0.09**
	(153.37)	(83.74)	(37.28)	(83.59)	(0.04)
R ²	0.28	0.31	0.23	0.19	0.22
家庭数量	534	534	534	534	534
样本数	3 752	3 752	3 752	3 752	3 752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人、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分别表示在1%、5%、10%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为家庭聚类标准误;个人、家庭特征包括年龄、教育、性别、婚姻、家庭规模等。

五、基准结果与机制分析

(一) 基准结果: 失业金标准提高对消费的影响

失业金标准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那是否能有效转化为参保失业家庭的消费?图3报告了失业金标准提高对家庭总消费的非参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失业金标准提高前家庭消费无明显趋势且均在0值附近,而在失业金标准提升后家庭消费即时增加,表明失业金标准提升带来的收入增加显著提高了参保失业家庭的消费。图3的非参事件估计结果有利于动态且直观地观测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后家庭消费的变化模式(Dobkin et al., 2018)。但系数含义不易理解,因此表1报告了参数事件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与非参估计结果完全一致。在影响程度上,失业金标准提升带来的收入增加大幅提高了参保失业家庭的消费。进一步根据表1列(1)和列(4)可知,失业金标准增加1元导致参保失业家庭的消费增加0.50元,且随时期逐渐增大,消费反应较为敏感。上述失业家庭消费变化的大小及趋势与已有文献的发现类似,如Ganong and Noel (2019)基于失业保险金领取时期有限的政策,利用事件分析法动态分析了失业保险金领取时限到期时,参保群体领取到的失业保险金显著且大幅下降后及失业期间家庭消费的变化,估算发现失业保险金每提升1美元会导致总消费增加0.77美元,上限为0.83美元。类似的,根据表1列(2)和列(4)可知失业保险金标准每提升1元会导致参保失业家庭至少提高0.66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向失业家庭的失业保险金可较为高效地转

化为消费，资金效率较高，意味着提升失业金标准是优化失业保险基金配置、改善基金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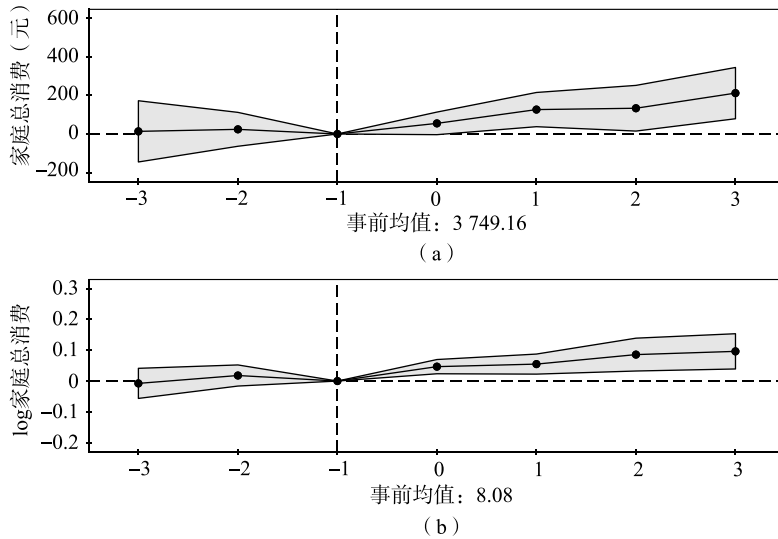


图3 失业金标准提高与家庭总消费

注：横轴表示相对失业保险金提高的月份。阴影表示估计系数的 \pm 95%置信区间。

(二) 机制分析：流动性约束与有限理性

在不可预期的暂时性收入冲击下，消费反应程度取决于冲击的大小。因此在低待遇背景下，国内各界普遍认为我国失业金标准调整无法有效改善失业者生活。那该如何理解本文所观测到的消费敏感现象？在这一小节，本文将为其提供理论解释。

家庭生产、有限理性、流动性约束是现有消费理论中经常被用于解释消费对收入变化反应敏感的三种假说。家庭生产假说认为，消费对收入变化的敏感反应是由闲暇时间的变化所驱动的。在家庭生产假说中，消费和时间都是家庭生产函数的重要投入，由于收入变化往往伴随着闲暇时间（劳动供给）的变化，家庭会通过重新调整时间和消费的投入进行生产，这可能会导致消费的敏感变化。如失业、退休或患病都伴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劳动供给的减少），这意味着家庭可显著增加时间投入，进而可能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搜寻更便宜的物品或自我生产物品，导致观测到的消费支出显著下降（Aguiar and Hurst, 2005；Banks et al., 1998；Bernheim et al., 2001；Jappelli and Pistaferri, 2010）。在失业保险背景下，已有文献主要通过分析失业保险替代率与个体失业前后消费下降幅度的关系来检验失业保险金的消费平滑效应（如 Gruber, 1997；Browning and Crossley, 2001；East and Kuka, 2015）。但由于上述研究的结果变量是消费在就业与失业之间的差异，不仅包含收入的变化还同时伴随着就业状态的改变（就业转为失业），即包含闲暇时间的增加（劳动供给的减少）。因此，已有研究所观测到的消费对失业金变化的敏感效应可能是由于时间投入的增加所导致。

为避免家庭闲暇时间变化（劳动供给状态）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失业金标准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时，是在月度层面对比同一失业家户在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后消费的变化。失

业金标准提升前后期间的劳动供给状态未发生变化,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家庭时间未发生任何改变,仅涉及收入维度的变化。此外,根据图2可知,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后,包括工资在内的家庭其他收入无任何变化,也意味着劳动供给状态未发生改变。因此,家庭生产假说无法解释本文所观测到的消费敏感变化。

有限理性或短视假说认为,消费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是由于人类理性有限或短视,导致家庭未能有效利用储蓄或借贷来平滑暂时性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如 Ganong and Noel (2019) 发现,在失业开始时和失业保险金到期时,消费都会立即且大幅下降,并认为消费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由短视导致。然而,根据图1可知,家庭消费在失业冲击后并未立即大幅下降,而是缓慢地逐期减少,这与短视假说的预测不一致。此外,在短视情况下,消费应该对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对称(Jappelli and Pistaferri, 2010)。对比图1与图3可知,这与本文证据不一致。因此,有限理性或短视假说可能无法有效解释本文所观测到的消费敏感变化。

流动性约束假说认为,家庭在受到暂时性收入冲击时,由于家庭内部流动性资源不足且外部借贷资源受限,消费会发生敏感变化。在流动性约束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与财富水平低且私人消费信贷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居民面临很强的流动性约束(甘黎等, 2018)。流动性约束也许可有效解释本文所观测到的消费敏感变化。根据流动性约束假说可预测,受失业冲击影响,家庭外部借贷虽受限,但我国家庭的高储蓄特征意味着仍可通过储蓄等内部流动性资源来平滑消费。然而,由于储蓄等内部流动性资源有限且在失业期间受限于借贷约束,随着储蓄等家庭内部流动性资源的消耗,家庭不得不逐渐削减消费,即家庭因流动性约束导致在失业期间的消费处于低水平。这意味着,一旦在失业期间面临正向收入冲击,家庭流动性约束的缓解会让消费显著提高。综上可知,流动性约束假说预测,失业冲击下家庭内部流动性资源的不足且外部借贷的受限,会导致家庭消费在失业金标准的小幅提升下显著增加。上述预测与本文图1和图3的证据一致。

此外,流动性约束假说还预测流动性约束不同的家庭在消费对收入的反应上有明显差异(Browning and Crossley, 2001; Dynarski and Sheffrin, 1987; Gruber, 1997; Johnson et al., 2006)。而有限理性或短视假说预测消费对收入变化的敏感反应在高、低程度流动性约束群体间不应有差异。为进一步验证流动性约束假说对消费敏感变化的解释,本文分析了高、低流动性约束组别间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关于家庭流动性约束,参照现有文献采用以下指标予以度量:基于事前家庭流动性资产(现金+存款-失业保险金)与家庭平均三个月支出的大小予以度量,这一度量方法主要参照尹志超等(2021)^①。

本文在上述度量方法下估计了高、低流动性约束组别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图4依次报告了非参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消费对收入变化的反应在高、低流动性约束组间并不一致,并且在高流动性约束组别尤为明显,与流动性约束假说的预测一致。

^① 本文基于事前家庭借贷水平(参照宋明月和臧旭恒(2020))、事前家庭收入高低(参照甘黎等(2018))、外出就餐支出高低(参照蔡栋梁等(2018))进行分组分析,结果与图4一致,详见附录III。

这表明流动性约束更可能是低待遇水平下我国失业保险仍具有显著消费改善效应的解释。^①

相对于高收入群体，失业保险消费改善效应对低收入等高流动性约束群体尤为明显。这意味着，一方面，由于我国失业保险参保群体相对于未参保群体而言收入较高，表明本文所估的失业保险消费改善效应是一个下限，随着失业保险覆盖率向低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失业保险的消费收益可能将越发明显；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失业保险有效保障了参保群体中经济相对弱势的群体，随着失业保险覆盖率的扩大有利于减缓与收入相关的消费不平等及增强社会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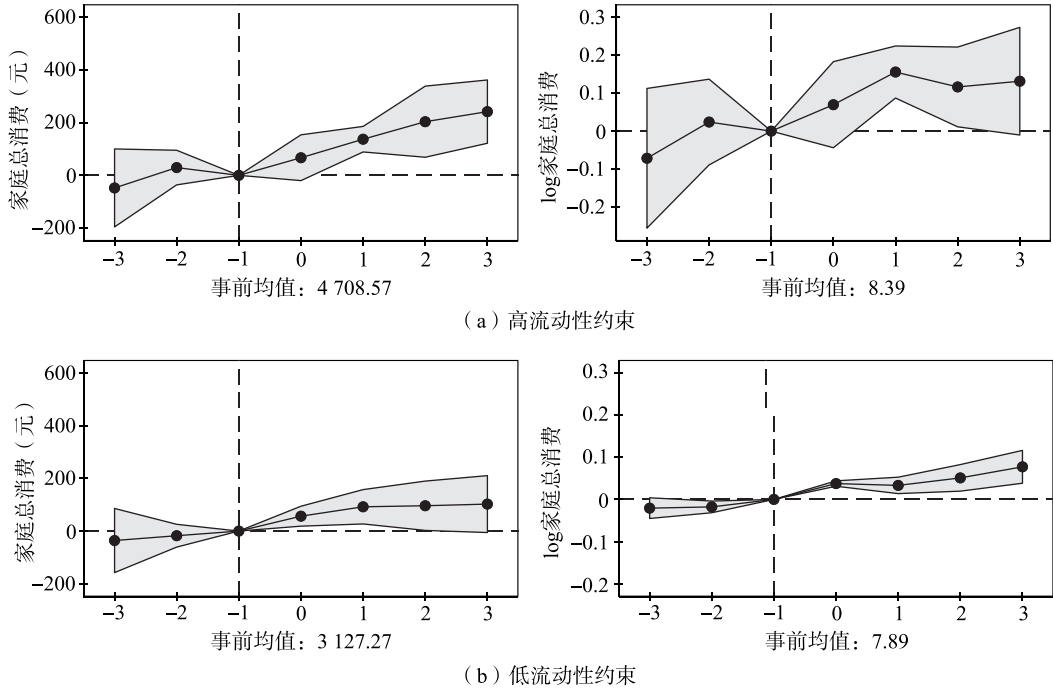


图4 流动性约束机制分析：流动性资产与支出

注：横轴表示相对失业保险金提高的月份。阴影表示估计系数的 \pm 95%置信区间。

六、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接下来依次对地区经济特征差异、失业保险参保口径、失业保险领取等可能影响本文结论的潜在扰动进行分析。^②

(一) 安慰剂检验

地区失业金标准的提高可能伴随着其他与消费相关的社会经济特征变化，如会影响家庭消费变化的最低工资等政策的调整。为排除上述这类因素对本文结果的扰动，图5(a)和

^①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在失业保险领取样本下高、低流动性约束家庭间消费对失业金标准变化的反应，与图4结果一致，详见附录IV。

^② 此外，还做了收入变化可预期性、样本结构变化、模型设定、税制改革影响（赵达和王贞，2020）等稳健性检验，结果稳健，详见附录V。

图5(b)、图5(c)和图5(d)分别报告了控制最低工资后以及在未参保失业群体下的估计结果。图5(a)和图5(b)结果显示,控制最低工资后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表明最低工资并不会影响本文结论。此外,将样本限制为未参保失业家庭样本后应预期失业金标准提升不会导致家庭消费的改变。图5(c)和图5(d)结果与该预期一致,在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后未参保失业家庭的消费无任何明显变化趋势且均在0值附近,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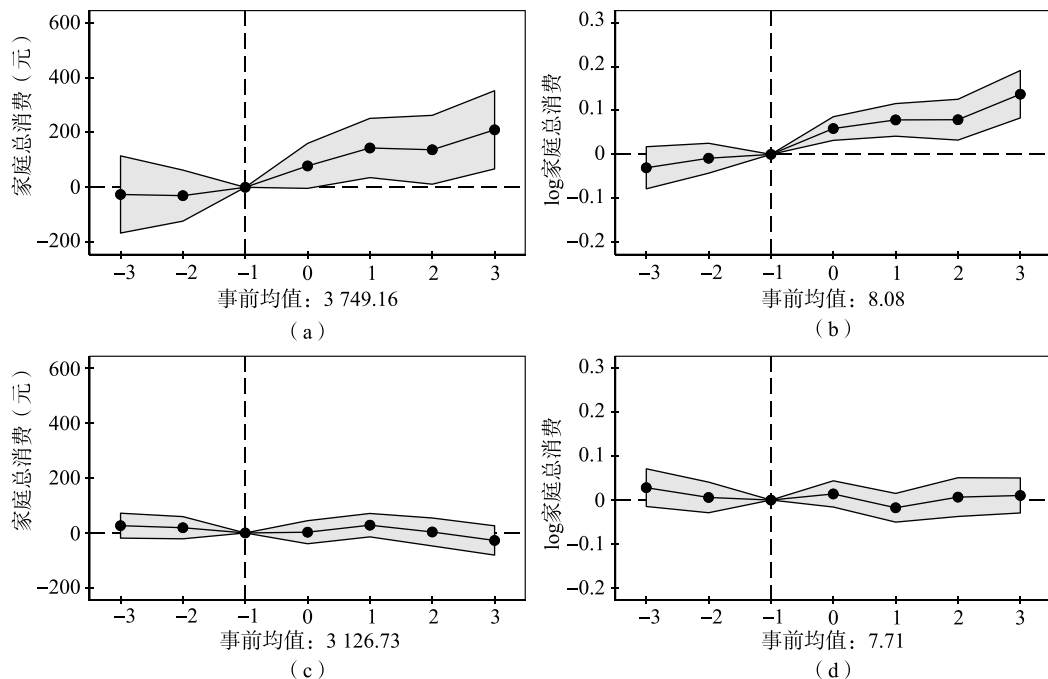


图5 控制最低工资与安慰剂检验

注:横轴表示相对失业保险金提高的月份。阴影表示估计系数的+(-)95%置信区间。

(二) 失业保险参保口径

由于2015—2016年UHS数据中仅有家庭层面的失业保险参保信息,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因此上述分析中采用的是家户层面的参保信息,由此产生的度量误差问题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是一种低估的保守估计。为验证上述统计口径是否会显著影响本文结论,接下来分析了不同失业保险个人参保统计口径下失业金标准的消费改善效果。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征可知,参保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极有可能也参保了失业保险,本文在已有失业保险参保信息的基础上基于上述判断进一步将样本限制为经历了失业的家户成员在失业前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图6中的(a)、(b)、(c)依次报告了将样本限制在参加了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养老保险、同时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样本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不管在何种统计口径下,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参保统计口径未影响本文结论。^①

^① 本文通过对比失业前后家户失业保险缴纳金额是否减少判断是否参保,估计的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详见附录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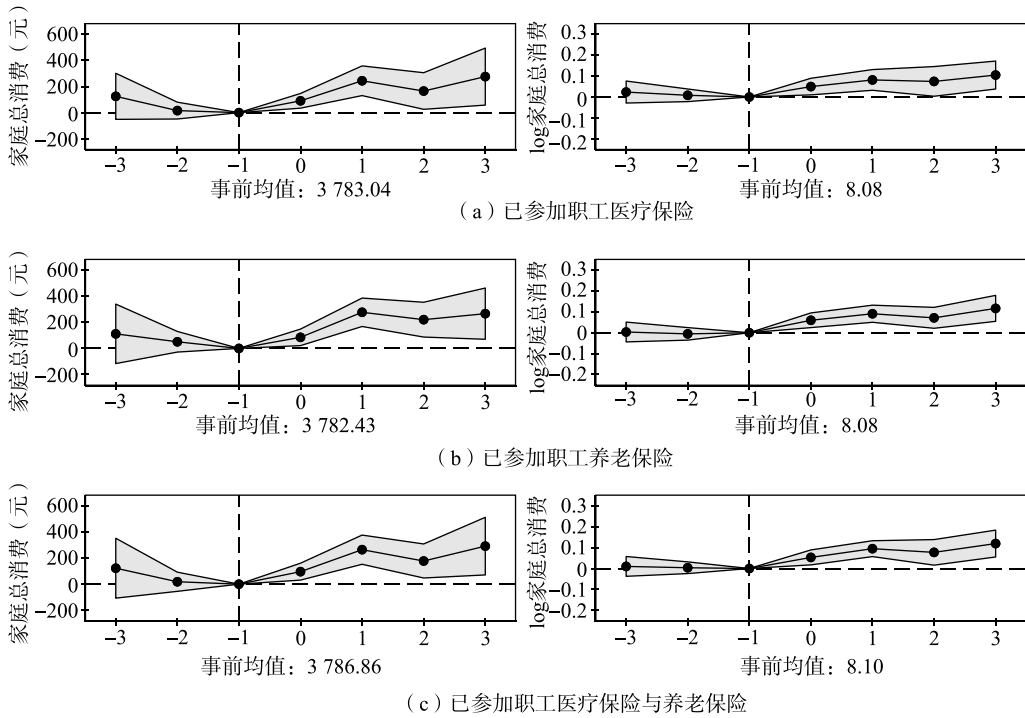


图 6 失业保险参保口径：限制为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注：横轴表示相对失业保险金提高的月份。阴影表示估计系数的 \pm 95%置信区间。

(三) 失业保险领取

尽管基于参保失业保险样本的分析更有利于避免内生性问题及观测到与政策更为相关的结果，但为进一步检验失业保险对消费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在领取失业保险样本下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失业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领取样本下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的动态估计结果与在参保群体下所观测到的结果一致，验证了基于参保群体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详见附录 V）。此外，也发现在领取样本下观测到的失业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强。

七、进一步分析

消费平滑被认为是失业保险最大的福利收益，接下来本文将从家庭消费结构视角考察失业保险对参保失业家庭各类消费的影响。参照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本文将消费划分为家庭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①

(一) 家庭生存型消费：食品、服装、住房、日用品与家庭设备消费

食品消费，是居民维持最基本生活的生存型消费。已有文献发现失业冲击引致的收入下降会导致食品消费的显著减少（Campos and Reggio, 2020），失业保险作为保障失业家庭基本生活的重要工具，改善家庭食品消费是其保障功能的重要体现。本文分析了

^① 回归结果详见附录 VI。

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参保失业家庭食品消费及结构的影响,发现失业金标准提高可显著增加食品消费,并且主要是增加了营养价值相对较高的高蛋白质类食品(如肉、禽、蛋、水产品、瓜、奶类)的消费。这表明失业金标准提高不仅能显著增加失业家庭的食品消费,还能改善家庭食品营养结构,有利于家庭食品营养水平的提高。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服装、住房、日用品、家庭设备用品等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上述消费在失业金标准提升前后无明显趋势且均在0值附近,意味着在失业期间家庭更倾向于将有限资源优先用于保障食品营养摄入等基本生活需求。

(二) 家庭发展型消费: 医疗、保健、教育、文娱与交通通信

在健康方面,失业冲击会导致健康水平及健康行为的恶化(Sullivan and Wachter, 2009),失业金标准提升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也许可通过增加健康投资改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Kuka, 2020)。为验证上述可能,本文分析了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失业者健康状况与失业家庭健康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失业金标准提升后失业者不良健康水平概率显著下降,医疗保健支出呈显著下降趋势。并且,家庭医疗保健支出中保健类等健康投资支出增加、医疗药品类支出减少。在健康行为上,家庭烟、酒等不健康消费无显著变化,这与Kuka(2020)的发现一致。总结可知,失业金标准提高具有显著的健康改善效应。

在教育文娱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失业家庭在收入受限时往往会缩减健康或教育等具有长期收益的消费。现有研究发现失业保险可通过收入效应减缓教育投资的恶化(Barr and Turner, 2015; Regmi, 2019)。文章分析了失业金标准提升对教育文娱支出的影响,发现失业金标准提高显著增加了参保失业家庭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家庭教育投资增加尤为明显。这表明我国失业保险也有利于改善失业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此外,本文还发现失业金标准提升显著提高了家庭交通通信支出,这可能是由于失业金标准提升降低了失业者搜寻工作的货币成本进而提高了搜寻努力所导致(梁斌和冀慧, 2020)。

为直观观察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图7总结了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各类消费的平均影响。可以发现,失业金标准提升主要改善了食品消费这一基本生活需求及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家庭发展型消费,对除食品之外的其他家庭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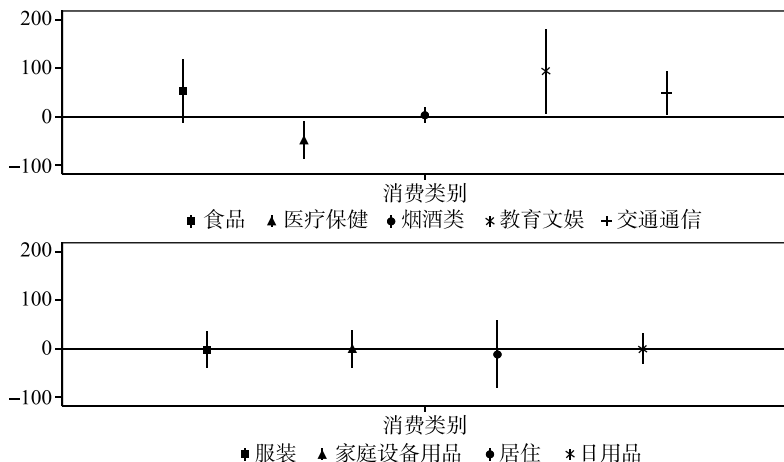


图7 失业金标准提升与家庭消费结构

注: 竖线表示估计系数的±(一)95%置信区间。

八、政策含义与未来拓展

在失业问题凸显及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有效发挥失业保险金的生活保障作用尤为重要。为厘清我国失业保险金生活保障的实际效果与作用规律，本文基于家庭消费视角，采用事件分析法系统考察低待遇背景下失业金标准提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失业金标准提升显著改善了参保失业家庭的消费及消费结构，流动性约束是驱动消费改变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失业保险金是帮助家庭应对失业冲击的有效手段。

当前大量失业保险基金流向企业，而保障生活方面支出较少。本文发现的失业金标准提高可相对高效地转化为家庭消费的结论，意味着提高流向失业家庭的保险基金有利于优化基金配置、提高基金效率以更好实现其生活保障功能。而且，提升失业金标准还有利于提高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这对失业者福利的长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国失业保险目前主要覆盖的是经济状态相对良好的群体，对于经济状态相对较弱的群体（如农民工等群体）而言覆盖率较低。但本文发现失业保险的消费改善效果在流动性约束更高的群体中更加明显。这表明扩大低收入群体的失业保险覆盖率可有效保障相对弱势群体的生活、降低失业者的福利损失，对于社会不平等问题减缓及社会福利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设仍需完善，为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系统厘清失业保险的福利效应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失业保险如何影响企业雇佣行为，如何影响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再就业选择等。此外，在此基础上，探索失业保险基金如何在企业与个人之间分配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也尤为重要，这对促进失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Aguiar, M., and E. Hurst, "Consumption versus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 (5), 919-948.
- [2] Banks, J., R. Blundell, and S. Tanner, "Is There a Retirement-Savings Puzz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 (4), 769-788.
- [3] Barr, A., and S. Turner, "Out of Work and into School: Labor Market Policies and College Enrollment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5, 124, 63-73.
- [4] Bernheim, B. D., J. Skinner, and S. Weinberg, "What Accounts for the Variation in Retirement Wealth among U. S. Househol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4), 832-857.
- [5] Browning, M., and T. F. Crossley,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 Levels and Consumption Chang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80 (1), 1-23.
- [6] 蔡栋梁、邱黎源、孟晓雨、马双, "流动性约束、社会资本与家庭创业选择——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18 年第 9 期, 第 79—94 页。
- [7] Campos, R. G., and I. Reggio, "Do the Unemployed Pay Lower Prices? A Reassessment of the Valu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0, 18 (5), 2135-2181.
- [8] Chodorow-Reich, G., J. Coglianesi, and L. Karabarbounis, "The Macro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Benefit Ex-

- tensions: A Measurement Error Approa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34 (1), 227-279.
- [9] Coombs, K., A. Dube, C. Jahnke, R. Kluender, S. Naidu, and M. Stepner, “Early Withdrawal of Pandemic Unemployment Insurance: Effects on Earnings, Employment and Consump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021, No. 22-046.
- [10] Dobkin, C., A. Finkelstein, R. Kluender, and M. J. Notowidigdo,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ospital Admi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 (2), 308-352.
- [11] Dynarski, M., and S. M. Sheffrin, “Consump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7, 102 (2), 411-428.
- [12] East, C. N., and E. Kuka, “Reexamining the Consumption Smoothing Benefits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5, 132, 32-50.
- [13] Fu, W., and F. Liu,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Cigarette Smoking”,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9, 63, 34-51.
- [14]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 “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 《经济研究》, 2018年第12期, 第34—50页。
- [15] Ganong, P., and P. Noel, “Consumer Spending during Unemployment: Positive and Normative Im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 (7), 2383-2424.
- [16] Ganong, P., F. Greig, M. Liebeskind, P. Noel, D. Sullivan, and J. Vavra, “Spending and Job-Finding Impacts of Expanded Unemployment Benefits: Evidence from Administrative Micro Dat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2, No. w30315.
- [17] Gruber, J., “The Consumption Smoothing Benefits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1), 192-205.
- [18] 黄觉波、王静、徐明东, “失业保险、道德风险与激励机制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年第4期, 第84—93页。
- [19] Jäger, S., B. Schoefer, S. Young, and J. Zweimüller, “Wages and the Value of Non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 (4), 1905-1963.
- [20] Jappelli, T., and L. Pistaferri, “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Income Change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0, 2 (1), 479-506.
- [21] Johnston, A. C. and A. Mas, “Potenti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Duration and Labor Supply: The Individual and Market-Level Response to a Benefit Cu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126 (6), 2480-2522.
- [22] Johnson, D. S., J. A. Parker, and N. S. Souleles, “Household Expenditure and the Income Tax Rebates of 200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 (5), 1589-1610.
- [23] Kroft, K., and M. J. Notowidigdo, “Shoul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Vary with the Unemployment Rate?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6, 83 (3), 1092-1124.
- [24] Kuka, E., “Quantifying the Benefits of Social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Heal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0, 102 (3), 490-505.
- [25] 李珍、王海东, “完善失业保险之微观保障及宏观管理功能研究——基于金融危机的启示”, 《保险研究》, 2010年第2期, 第37—43页。
- [26] 李珍、王怡欢、张楚, “中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方向: 纳入社会救助——基于历史背景与功能定位的分析”, 《社会保障研究》, 2020年第2期, 第68—75页。
- [27] 梁斌、冀慧, “失业保险如何影响求职努力? ——来自‘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20年第3期, 第179—197页。
- [28] 刘军强, “政策的漂移、转化和重叠——中国失业保险结余形成机制研究”, 《管理世界》, 2022年第6期, 第101—117页。
- [29] Low, H., C. Meghir, and L. Pistaferri, “Wage Risk and Employment Risk over the Life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4), 1432-1467.
- [30] Marinescu, I., and D. Skandali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Job Search Behavi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 of Economics*, 2021, 136 (2), 887-931.
- [31] Miller, S., N. Johnson, and L. R. Wherry, "Medicaid and Mortality: New Evidence From Linked Survey and Administrative Dat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1, 136 (3), 1783-1829.
- [32] 彭章、施新政、陆瑶、王浩, "失业保险与公司财务杠杆", 《金融研究》, 2021年第8期, 第152—171页。
- [33] 乔雪、陈济冬, "失业保险政策对隐性就业规模和社会产出的影响", 《世界经济》, 2011年第2期, 第87—102页。
- [34] Regmi, K., "Examining the Externality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Economic Inquiry*, 2019, 57 (1), 172-187.
- [35] 宋明月、臧旭恒, "异质性消费者、家庭债务与消费支出", 《经济学动态》, 2020年第6期, 第74—90页。
- [36] Sullivan, D., and T. Wachter, "Job Displacement and Mortality: An Analysi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 (3), 1265-1306.
- [37] Tefft, N., "Insights on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1, 30 (2), 258-264.
- [38] 吴永球、冉光和、曹跃群, "失业保险金与再就业行为", 《经济学》(季刊), 2008年第1期, 第231—254页。
- [39] 尹志超、仇化、潘学峰, "住房财富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 《金融研究》, 2021年第2期, 第114—132页。
- [40] 尹志超、郭沛瑶,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21年第4期, 第64—83页。
- [41] 张燕、王元月, "中国最优失业保险水平设计的经验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年第6期, 第123—136页。
- [42] 张盈华、张占力、郑秉文, "新中国失业保险70年: 历史变迁、问题分析与完善建议", 《社会保障研究》, 2019年第6期, 第3—15页。
- [43] 赵达、王贞, "个人所得税减免有助于中国城镇家庭提高消费吗?", 《统计研究》, 2020年第5期, 第27—39页。
- [44] 赵静, "失业保险与就业促进——基于基金支出范围视角的双重差分法分析", 《中国经济问题》, 2014年第1期, 第81—90页。
- [45] 郑秉文, "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增长原因分析及其政策选择——从中外比较的角度兼论投资体制改革",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年第6期, 第1—20页。

Unemployment Insurance,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XIE Qia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 Ju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YU Sinuo*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AI J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consumption smoothing effect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s essential for optimizing its fund allocation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function. Based on the monthly household diary data, we find that unemployment benefit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boosts unemployed households' consumption,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consumption change is obvious, which can be better explained by the liquidity constraint hypothesis than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theory and the myopic hypothesis. Moreover, the unemployment benefits increase improv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cluding an increase in developmental consumption with long-term benefits.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is worthy of attention.

Keyword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s; household consumption; liquidity constraint

JEL Classification: J65, D12, D11

* Corresponding Author: Lyu Sinuo, School of Economic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18, China; Tel: 86-17319221637; E-mail: 202301023@muc.edu.cn.